

日藏《土官底簿》四库底本的文献学价值

辜梦子

内容摘要:《土官底簿》为官府档案的抄件,是研究明代少数民族制度及其运作的重要资料。通行版本为《四库全书》本,另有清彭氏知圣道斋抄本、孔氏岳雪楼抄本和天尺楼抄本存世。日本关西大学长泽文库亦有藏本,内有两淮盐政采进木记、满汉双文“翰林院印”,书内有浮签,随处可见四库馆臣的校改痕迹,卷末有杭世骏手抄朱彝尊跋文。经比较,它与文渊阁本编排一致,故可认定为四库底本。以此本校校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该书提要,可知提要对此书的底本、所记土官数量、年代下限等的记述皆需要修正。此本首页有清末沈曾植、沈曾桐兄弟二人之印,知曾由他们收藏,疑于1920年代散出,为长泽规矩也所得。

关键词:《土官底簿》 四库全书 四库底本

引言

日本关西大学承自江户时代的汉学塾“泊园书院”,在东亚文化研究领域成果斐然。该校图书馆“长泽文库”是为长泽规矩也旧藏设立的专藏。

长泽规矩也(1902-1980),字士伦,号静庵,神奈川人。192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汉学科,师从塩谷温教授。他与川濑一马共同创立“书志学”,致力于以中国文学及汉籍为中心的书志学研究。1926年到1932年间,长泽曾六次到中国,寻访中国古籍和日本刻本文献,收获颇丰。长泽去世之后,他所遗存的三万馀册图书归关西大学,该校为之设立“长泽文库”^①。

2012年,中山大学黄仕忠教授与关西大学内田庆市教授开展合作,获取了“长泽文库”一批善本古籍的彩色照片,并于2019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

^①黄仕忠:《日本关西大学长泽规矩也文库藏稀见中国戏曲俗曲汇刊》前言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9年,第1-4页。

社影印出版。其中有一部《土官底簿》的抄本,笔者为其影印本的解题撰写者。随着对此本的认识逐渐深入,发现原撰解题存在诸多讹误需要纠正,且有许多未详之处值得探讨。

《土官底簿》二卷,不著撰人名氏,内容为明代土官的授职、承袭、升迁、惩处,以及西南地区的贡赋制度、土兵征调等的记录,是研究明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政治制度及实际运作的重要资料。其来源为官府的档案文书,用于校对、查询,故名“底簿”。如洪武二年冬,朝廷向边境官司颁发铜铸信符和金字红牌,即有底簿备查:

制信符及金字红牌,颁给云南……等府州土官。其制,铜铸信符五面,内阴文者一面,上有“文行忠信”四字,与四面合,及编某字一号至一百号批文,勘合底簿。其字号,如车里以“车”字为号,缅甸以“缅”字为号,阴文信符勘合,俱付土官底簿,付云南布政司。其阳文信符四面及批文百道,藏之内府。凡朝廷遣使,则赍阳文信符及批文各一,至布政司,比同底簿,方遣人送使者。^①

四库馆臣认为此种《土官底簿》来自“好事者”的抄录:“观其命名与缮写之式,疑当时案牘之文,而好事者录存之也。”^②此书的通行版本为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,另有清代彭氏知圣道斋抄本^③、孔氏岳雪楼抄本、天尺楼抄本等版本存世。“长泽文库”所藏抄本实为四库底本,从中可见四库全书的采择、校改情况,对于了解此书的版本流变、收藏流向等,也颇有价值,故撰此文,以作进一步探讨。

一、日藏《土官底簿》概况

“长泽文库”所藏《土官底簿》,抄本,共两册,分为上、下两卷。长 28.5 厘米,宽 18.4 厘米,半叶九行,每行二十字。索书号:CL23-B-18、CL23-B-19。

上册书衣下方盖有朱色木记:“乾隆三十八年七月两/淮盐政李质颖送到/土官底簿壹部/计书贰本”,其中“七”“土官底簿壹部”“贰”为朱笔书写,其余为木记印文。另有一印与木记局部重叠,模糊不可辨。右侧有六字“发四分 张世□”,末一字被图书馆标签覆盖。书衣左侧有贴签,已残损,仅能隐约辨认“分校”二字,根据残存笔划及夹签,推测部分内容或为

^①张辅等:《明太宗文皇帝实录》卷三一,“中央研究院”校印本,1963 年。

^②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七九《史部三十五·职官类·官制·土官底簿》,中华书局,1965 年,第 685 页。

^③今藏于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:善本 00658)。

“分校蔡必昌”。

上册扉页左上题“土官底簿 上”，左下题“○堇浦抄 曝书亭”，二者字迹显然不同。扉页后两页有贴签，书“土官底簿 二本”。

上册首页覆有浮签，书“钦定四库全书/○土官底簿卷上/○○云南/云南府云——/板心俱低三格写”（——为一条线）。揭去浮签，正文首页钤有三方朱色印章，分别为：满汉双文“翰林院印”、“广道意斋收藏图籍印”“藁宦”。

下册书衣亦有贴签，已残损，隐约可辨者仅“共□分校”数字；右下有几个字，墨色淡褪，仅首字“万”隐约可辨，其余为图书馆卷标覆盖；左下贴有残签，上有一“支”字。

下册扉页右半页右下角书“钦 露雨拾/驿丞写”，左半页左上角斜书“芒中遂月”四字。

下册正文倒数第二页有局部朱色长方形双边印记“荆川太史纸”（见图1A），这是纸厂出品的印记；正文末页有蓝色横截式印记（见图2A），是整刀纸出厂时在横截斜面加盖的印章，拆开之后纸张上就留下了横断的局部印记。关于古籍中的纸厂印记，已有学者做过研究，多认为纸厂印记和红蓝截印可作为清代古籍的鉴定标识^①。台北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（以下简称“台图”）藏清抄本《徐霞客游记》也有局部的朱色纸厂印记（见图1B），印文为“（前缺）厂督造古匡荆川太史纸”^②，该馆藏旧抄本《胡澹庵先生文集》亦有同款印记（见图1C）^③。根据有关文献数据库提供的影像与缩放比例说明，

①相关研究包括：张宝三《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钤纸厂印记研究》（《台大中文学报》第39期，2012年）、《纸厂印记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鉴定之运用》（《“国家图书馆”馆刊》2015年第2期）、宋叶《传世古籍中“纸号”的搜集和整理》（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，2018年）等，对纸厂印记的内容、形制、成因及其在版本鉴定、造纸史研究等方面的价值进行了详尽的论述。白木《古代名纸的演变与鉴赏》（《中国印刷》2003年第1期）有对“荆川太史纸”的专门介绍。任晓辉《俄罗斯圣彼得堡藏钞本石头记目验再记》（《红楼梦学刊》2013年第3期）因俄藏《石头记》抄本衬纸上有纸厂印记和横截印记，对古籍纸张、纸厂印记、红蓝截印等问题亦有讨论。

②张宝三《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钤纸厂印记研究》提及清抄本《徐霞客游记》纸厂印记，称其印文为“（前缺）厂督造古匡荆川太史纸”，未附图片。笔者检索得该藏本影像，图片清晰显示为“古匡”，读为“古匡”显误。关于“古匡”，叶梦珠《阅世编》将“荆川太史连”与“古匡将乐纸”并称，任晓辉《俄罗斯圣彼得堡藏钞本石头记目验再记》称“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实验室的易晓辉先生在介绍‘古匡将乐纸’时，也肯定地说古匡也是福建的地名”，此说待考。

③宋叶《传世古籍中“纸号”的搜集和整理》附有台藏《胡澹庵先生文集》书影，文中提及清抄本《徐霞客游记》的纸厂印记，皆读为“（前缺）厂督造古匡荆川太史纸”，亦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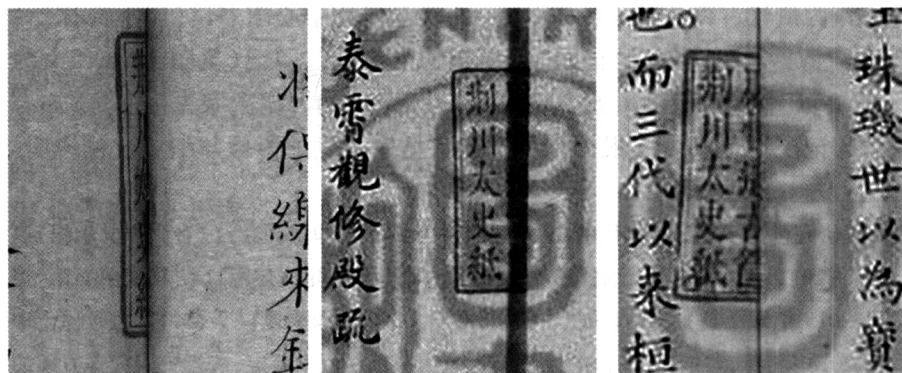
测算可知,此二者与日藏本的纸厂印记高度相似,长边皆为4.6厘米左右,字体相仿,很有可能即为同一枚。同时《胡澹庵先生文集》还有与日藏本相似的横截印记。《土官底簿》和《胡澹庵先生文集》抄本年代不详;《徐霞客游记》则有清人奚又博、杨名时的序跋,可确认为清抄本。三者的纸张尺寸也非常接近^①,既有同款纸厂印记,又有相似的横截印记,可知它们的用纸为同厂出产,时间比较接近。由此推测,日藏本应为清初抄本。

日藏本不避清帝名讳。但遇到“圣旨”“诰命”“钦”“诏”“敕”“覲”“贡”“恩”及“太祖”“太宗”等字则提行,并比正文高数格书写,应系严格过录底本而保留了明代档案文书格式。

此本正文有多种字迹,抄写者或有数人。内页多见修订夹签,正文内有换行标记、墨笔校改、朱笔校改等痕迹。

综合前述,可以判断,日藏《土官底簿》抄本应为清初抄本,它与《四库全书》收录之本关系十分密切。

图1 同枚“荆川太史纸”纸厂印记^②



A《土官底簿》

纸厂印记

“(前缺)荆川太史纸”

B《胡澹庵先生文集》

纸厂印记

“(前缺)厂督造古筐荆川太史纸”

C《徐霞客游记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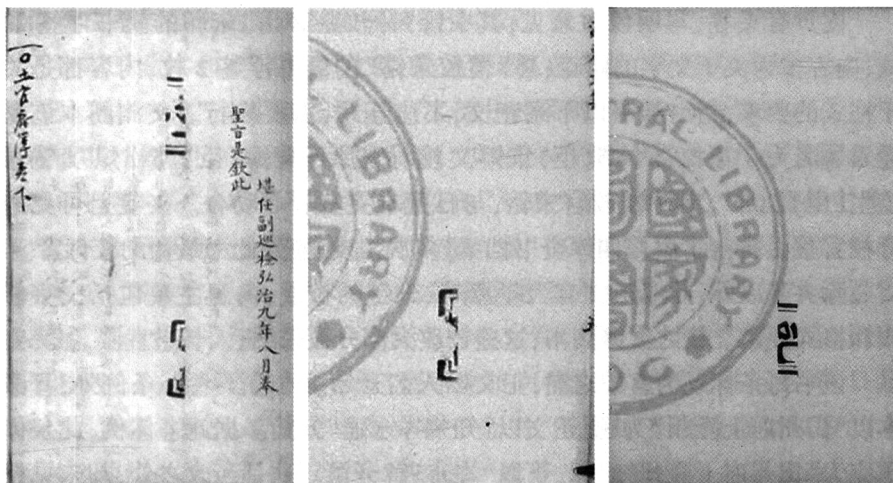
纸厂印记

“(前缺)厂督造古筐荆川太史纸”

①据彩色照片所示,日藏本《土官底簿》尺寸为28.5×18.4厘米。据该馆资源数据库公布,台图藏《胡澹庵先生文集》尺寸为28.1×18.2厘米、《徐霞客游记》尺寸为28.4×18.7厘米。

②台图藏《胡澹庵先生文集》(索书号:402.53 10449)、《徐霞客游记》(索书号210.6 04027)的图片来自该馆“古籍与特藏文献资源”数据库。

图2 纸厂横截印记



A《土官底簿》
纸厂蓝色横截印记

B《胡澹庵先生文集》
纸厂横截印记

C《徐霞客游记》
纸厂横截印记

二、日藏《土官底簿》为四库底本

罗琳在其主编《四库全书底本丛书》的“前言”中对判定“四库底本”（“四库进呈本”中的一小部分）的基本依据做了说明^①，今观日藏《土官底簿》，完全符合四库底本的特征。

1. 书衣朱色木记与翰林院印

上文提及日藏《土官底簿》上册书衣上的朱色木记显示该本为“乾隆三十八年七月两淮盐政李质颖送到”。按，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十一日《两淮盐政李质颖奏续进获旧板等书开单呈览折》中有“今觅得旧板书十五种，仿旧板抄本书七种，敬谨装潢，恭进呈览。又觅得抄本书十六种。……伏思此内或有可备四库全书采择者”的记载^②；《两淮盐政李续呈送书目》中有“（明）土官底簿二卷，二本”^③。可知日藏《土官底簿》即为李质颖所呈的“抄本书”之一种。

又，日藏《土官底簿》正文首页钤有满汉双文“翰林院印”，约 10.5cm 见方，此亦为四库进呈本的标识之一。

2. 浮签与校改

上册首页粘有规定抄录格式的浮签：“钦定四库全书”顶格写，“土官底簿卷上”次一行空一格写，“云南”又次一行空二格写，“云南府云……”再起

①罗琳主编：《四库全书底本丛书》前言，文物出版社，2019 年。

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上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 年，第 138 页。

③吴慰祖校订：《四库采进书目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60 年，第 61 页。

一行低三格写,此格式与文渊阁抄本该书样式完全吻合。

内页有夹签,写明校改意见,其中钤“分校蔡必昌”朱印的墨书浮签 23 枚,内容多为关于文字的修订;署“覆校宋镕”的墨书浮签 2 枚,内容都是关于格式的要求,指出某字以下系正文,不应连写,需要换行。文渊阁本该书卷末署名为:“覆校官中书(臣)宋镕”“校对官原任典簿(臣)郭祚炽”“誊录监生(臣)刘绅”,其中覆校官宋镕,与日藏本夹签署名吻合。夹签上可见的分校官蔡必昌,在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多次出现,应是此书最初的校订者。

除夹签以外,此本正文有大量墨笔、朱笔的校改,内容主要包括文字修改和格式要求。校之文渊阁本,这些校改大部分被采纳。

该书每条标题为官职之名,正文以人名开始。唯有下卷一条例外,日藏本以“田州府上隆州”为题,正文以“知州岑永通”开篇。据此书体例,此条标题应为“田州府上隆州知州”,下以“岑永通”开篇。这是当改之处,却未见校改,而文渊阁本与日藏本此条完全一致,显系沿其讹误,此为日藏本是文渊阁底本的另一证据。

3. 杭世骏手抄的朱彝尊跋

日藏本上册扉页左下题“○菴浦抄 曝书亭”,即杭世骏手抄朱彝尊跋文,字迹与正文、校改皆不同,下册卷末抄录朱彝尊《书〈土官底簿〉后》全文。朱跋原载于《曝书亭集》卷四十四,其中的“其种曰黎、曰玃、曰玃、曰獠、曰猺、曰獠”句,杭氏过录时少了“曰猺”二字,当系脱漏;文末增添“秀水朱彝尊跋”一句,此外还有“雄”“獠”等手写异体字。文渊阁本卷末亦有《土官底簿跋》,脱漏、添补与日藏本一致,异体字形也完全相同。据此知日藏本即为文渊阁本的底本。

三、日藏《土官底簿》所见四库全书修撰流程

1. 日藏本所见四库本修撰流程

近年来,学界通过对存世四库底本的研究,对四库全书的修撰流程有进一步的了解。如苗润博指出王重民“根据《乐全集》四库底本的校改情况,认为馆臣校书的流程当为:分校—纂修—总纂,而其中朱笔当系纂修官所加”,又对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这种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录而成的辑录本的修撰过程进行了推测,并认为“朱笔校改者当系总纂所为。不过,从大量卷次并无朱批的情况判断,这样的校改工作大概是以抽查方式进行的”^①。

日藏《土官底簿》为进呈本,篇幅短小,与卷帙浩繁的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

^①苗润博:《〈续资治通鉴长编〉四库底本之发现及其文献价值》,《文史》2015年第2辑,第239、240页。

大典辑出本的编撰过程有所不同。根据此本夹签、浮签及朱笔、墨笔校改,可以看出不同层级的修改权限和被接受情况。

比对日藏本和文渊阁本发现,墨笔校改(包括钤“分校蔡必昌”朱印夹签、署“覆校宋榕”夹签和文内校改)大部分被采纳,有20多处未被接受。朱笔校改共计69处^①,几乎全部被采纳,文渊阁本仅两处未改:“昆明县清水江巡检司巡检”条“去着西平侯常州差使他”句改“州”作“川”、“楚雄县主簿”条“无布政司保勘公文将普救发回”句改“救”作“故”。可以猜测,墨笔修改是分校官、覆校官所为,错字和格式要求多数写在夹签上,有些漏字位置较难表述,则直接补入正文;下一个环节的校对官(或更高层级的纂修官)则以朱笔校改。与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底本朱批可能以抽查形式进行不同,日藏本的夹签、墨笔和朱笔校改均匀分布于全书,可见对于这种篇幅较短的本子,各个层级的馆臣都进行了全篇校改。此外,还有日藏本并未校改、文渊阁本径改之处,如“云南府安宁州知州”条,日藏本有“节奉太祖皇帝圣旨”一句,文渊阁本改“奉”作“奏”;“澄江府江川县关索领巡检司土官巡检”条,日藏本为“领”字,文渊阁本改“领”作“岭”。

日藏本的校改情况,反映了馆臣在校书过程中的思考和争议,如上卷“孟良府知府”条,此条标题处“良”字有墨笔、朱笔重叠的修改痕迹,夹签的文字似可披露校改的先后顺序:

其一,正文“如今将歹指立做孟良府”处,“良”字首笔点画有涂抹痕迹,并有夹签,上以墨笔书“上良字既改作艮,则此处良字亦宜改矣。分校蔡必昌”(落款为朱文钤印,下同)。“上良字”即标题中的“良”字,可知此条标题原为“孟良府知府”,蔡必昌主张改为“艮”(且标题中的“良”字“一”一笔被墨笔描重过),因此也主张正文一并改之。

其二,夹签“分校蔡必昌”朱印之上,又覆有墨字:“当作良,据《明史》。”虽无落款,但从字迹看,不是蔡必昌的字,可能是覆校宋榕或其他官员所书。而标题的“良”字上一点,亦被墨笔描重过。

其三,但《明史》中仅有“孟良府”而无“孟艮府”,则改回“良”字的主张显误,于是具有最高权限的朱笔又将标题“良”字的“一”加描一遍。

最终文渊阁本采纳了蔡必昌和朱笔校改的意见,录为“孟良府”。

其他夹签和校改中,常见诸如“某字疑作某字”“某字应作某字”“某字

^①墨笔标记有部分是原抄录者在抄写过程中的修改,部分是四库馆臣的校改,另有一些未能确定。故本文仅统计日藏本有明确意见的朱笔校改标记,如改字、增删、格式要求等;另有零星的墨笔、朱笔符号,似为校读过程中点断、停顿之用,四库本亦未显示其校改意义,暂不计算在内。

似宜作某字”的内容,可以看到馆臣在校改过程中的思考与讨论。

而到了誊录环节,誊录官虽然遵循了大部分的校改意见,但也有未依校改之处,因此最终呈现于世的四库本,与底本的校改仍有一定程度的差异。

2. 关于“发四分”

日藏本上册书衣有“发四分”字样。结合四库全书的纂修过程,或可尝试对“发四分”进行释读。

乾隆三十九年(1774)六月,乾隆决定仿照浙江范氏天一阁,为四库全书建造专门的庋藏之所。后建成热河文津阁、圆明园文源阁、紫禁城文渊阁、盛京文溯阁,共计四阁,俗称“北四阁”。又命再抄写三份贮于江南,分别为镇江金山寺文宗阁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文澜阁,俗称“南三阁”。诸阁本中最早完成的为头分文渊阁本,其次为文溯、文源、文津三阁,其中文津阁本即第四分(详见下引)。

誊录过程并非抄完一分,再抄一分,而是同时进行。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初九日,武英殿总裁王杰《奏参提调陆费墀等遗失底本并请另选翰林充补折》批评底本遗失的情况,并称:“且底本若全,自应将头分发毕,然后以次发写二分、三分、四分。今数分一时并发,而头分未发写者几二百种,安知非因底本不全,其始欲假捐本以为弥补之方?其继即转借拖延,以为掩饰之计。”^①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日,永瑢上奏陈述四库全书四分之外再缮三分的诸多问题时亦称:“武英殿所有底本,现在赶办第三、四分,一时未能交出。今添写三分书,所需底本,应先尽官刻各书及《永乐大典》副本发写,其在馆贮有重本者,亦可陆续咨取发缮,约计可得十之四五。至每一底本发出,即令书手全写三分,庶缮校尤得迅速。”^②可以得知,在诸阁本的抄录过程中,底本是被辗转发至各分传抄的。日藏本上册书衣所写“发四分”,可能即为“发至第四分文津阁”的意思。

另一方面,文津阁本《土官底簿》之面貌,表明其为直接抄录底本而成,而非抄自文渊阁本:首先,内容较文渊阁本少。文津阁本仅有上下两卷,没有卷后跋文。若系依据文渊阁本抄录,则应全部照抄。究其原因,或是文津阁誊录官发现底本正文与卷后题跋字迹不同,认为卷后跋文没有抄写的必要,直接略去;也有可能如纪昀所称“文津阁书系第四分,当时事届垂成,未免急图完竣,错谬尤多”^③，“文津阁系第四分,其时写校诸臣以将次告成,遽求议

①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上册,第1153页。

②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下册,第1616页。

③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下册,第2081页。

叙,未免较为潦草”^①,在抄录文津阁本的时候,誊录官急于求成,能省则省。

其次,换行方式与文渊阁本不同。文渊阁本将诸省名称、诸土官官衔都作为条目,单列一行抄写,与正文分开,这种格式符合卷首浮签规定,然未遵循底本正文的换行标记。文津阁本上卷的格式恰与底本标记一致,单列省名,每个官衔及正文并作一段,逐段抄录。然至下卷,则仅单列省名,其余内容直接连写,完全没有分段。

复次,文津阁本部分校改与底本一致,而与文渊阁本不同。底本的校改与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之间的差异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关系,如:底本校改,二阁本皆从之;底本校改,文渊阁本未改,文津阁本改之;底本校改,二阁本皆未改;底本未改,文渊阁本径改,文津阁本从底本;底本仅有标记而无校改意见,或有多种校改,二阁本分取不同的意见等等。

如前所述,底本有一定数量的校改意见,文渊阁本并未采纳,文津阁本则遵循了这些意见,这种情况在下卷尤为突出。文津阁本的下卷虽然仅分省份,整篇大段连写,格式和字迹都较为潦草,却比文渊阁本更好地吸纳了校改意见。

以上情况都提示,日藏本应该也是文津阁本的底本。

一般认为,文渊阁本为头分,质量最优,而文津阁本为第四分,较为草率,错讹亦多。然《土官底簿》两个阁本的质量高下,未可轻易断言,此处仅举两例:

其一,上卷“云南府安宁州知州”条,底本作“会议土官申保等归附缘由,节奉太祖皇帝圣旨:……钦此”,并无校改,文渊阁本改“奉”为“奏”,文津阁本仍为“奉”。按照本句内容,且书中多有“奉太祖圣旨”句式,此处作“奉”字是,文渊阁本误改。

其二,下卷有“思城州知州”条,记土官赵氏,日藏本原为“恩”,墨笔改“恩”作“思”,文渊阁本未改,仍作“恩城州”,文津阁本从之作“思城州”。又有“恩城州知州”条,记土官岑氏,墨笔改“恩”作“思”,并注“恩城已见上文”;又有标记保留“恩”字,并划去注文以示撤销。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皆取“恩”字。由此,文渊阁本有两条“恩城州知州”;文津阁本则有“思城州知州”和“恩城州知州”。核查《明史》可知:恩城州土官为岑氏^②,思城州土官为赵氏^③。所以底本的校改是正确的,未遵循校改的文渊阁本有误,文津阁本则完全遵循。

①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下册,第2300页。

②张廷玉等:《明史》卷三一八《广西土司二》,中华书局,1974年,第8254页。

③张廷玉等:《明史》卷三一八《广西土司二》,第8233页。

四、据日藏《土官底簿》看四库提要的问题

日藏《土官底簿》抄本的发现,可用于核校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该书提要,由此可以发现四库提要存在以下若干讹误,需要加以辨正。

底本著录。《土官底簿》一书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其底本为“浙江汪启淑家藏本”。《浙江省第四次汪启淑家呈进书目》有“土官底簿 二卷”^①,《浙江采进遗书总录简目》亦有“土官底簿二卷(写本) 不著撰人”^②,此皆指汪氏藏本。由此可知,《土官底簿》的四库进呈本至少有两个:一为两淮盐政呈送的旧抄本(即日藏本),一为浙江巡抚呈送的汪启淑家藏本。

上文已考证日藏本当为《四库全书》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之底本。日藏本中有校改,则当有参校,汪氏藏本或为参校本。编撰《总目》时,由于并不是直接面对底本做记录,而是参照书目,李质颖呈送的旧抄本没有藏家来历,且书目著录为“(明)土官底簿”,与原题书名略有不同;而汪启淑是进献藏书之大家,因此四库馆臣误将此书底本著录为汪氏藏本。

记载时间下限。书前提要称此书“凡明正德以前云贵诸省土司爵氏、因袭皆载焉”,《总目》提要称“其书备载明正德以前诸土司官爵世系、承袭削除”。然考其内容,此书记载至晚者为明嘉靖十九年四月,故“明正德以前”之说为误。

记载土司数量。朱彝尊《〈土官底簿〉跋》记录此书所载土官数量为:“云南百五十一员,广西百六十七员,四川二十四员,贵州一十五员,湖广五员,广东一员。初隶验封,后以其半隶武选。”书前提要完全照抄朱氏的数字,并统计为“共三百六十三家”。《总目》则将“四川土司”的数量记为“二十家”,并统计为“共三百五十九家”(其他均同)。

然而,无论是书前提要还是《总目》,都和此书实际记载的土司数量有很大的差异。按照此书的编排原貌,所记土司数量是云南 142 家,广西 81 家,四川 15 家,贵州 15 员,湖广 3 家,广东 1 家。然其中个别条目的省份归属又有错误——“广南府同知”“宜良县汤池巡检司巡检”两条应该归属于云南,而错系于“广西”之下,所以实际记载的土司数量是云南 144 家,广西 79 家,四川 15 家,贵州 15 家,湖广 3 家,广东 1 家^③。

由于朱彝尊的学术大家身份,馆臣对其记录深信不疑,直接袭用,并没

①《四库采进书目》,第 100 页。

②《四库采进书目》,第 256 页。

③陈晓敏《明代的土官与土司制度——以〈土官底簿〉之记载为中心》(复旦大学 2012 年硕士论文),第 13、18 页)已提及此书土官数量和归属问题。

有真正校对过此书所记的土司数量。这对认识提要纂修依据,也有一定的帮助。而辨析四库提要著录问题之时,也应注意正本清源。

五、日藏本《土官底簿》的递藏源流

根据日藏本和现存版本的情况,可以推测此本的递藏情况。

朱彝尊《书〈土官底簿〉后》称其为“海盐郑氏藏本”,后人据此认为朱氏曝书亭藏有此书,四库馆臣则称朱氏藏书“抄之海盐郑氏”。显然,朱彝尊曾经阅览此书,或许还有可能抄录收藏。但日藏本、四库诸阁本所记土官数量远远少于朱氏记录的数字,或因此书流传过程中又有散佚。故日藏本不是朱氏所称的“海盐郑氏藏本”或其过录本。

康熙四十八年(1709),朱彝尊去世。雍正九年(1731),杭世骏从朱氏后人手中购得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稿本并作校补。乾隆十三年(1748),杭氏作跋曰:“右《千顷堂书目》,金陵黄俞邨所辑……岁在辛亥,从曝书亭朱氏购得此本,亟录出以箴史官之失。说者得无笑其迂乎。”^①既然杭氏与朱家曾有书籍交易,也有可能从朱氏处传抄获得《土官底簿》,然已非朱彝尊在世时所见的面貌。从日藏本卷后杭氏手迹来看,此本应是杭氏的藏本。杭世骏于乾隆三十七年(1772)去世^②,此本于次年为李质颖所得,呈送入四库馆。

除日藏本之外,此书的另一个进呈本来自浙江汪启淑家。杭世骏与汪启淑交游甚密,曾结社相酬。杭世骏为汪氏撰有《飞鸿堂集序》,汪氏《释明中传》则云:“乙丑岁,(明中)与予暨月田、江声、穆门、樊榭、董浦诸宗工结社相酬倡。”^③因此,杭世骏、汪启淑两家之间也可能存在藏书交流、相互传抄的情况。

在四库全书的纂修过程中,遗失底本是常见之事,馆臣私自抄录或者盗取底本亦不少见,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录有大量乾隆君臣要求清查底本、追责遗失底本之官员的内容。《土官底簿》存世版本之一,即为彭元瑞知圣道斋抄本,其文字、格式皆与日藏本高度相似。彭元瑞(1731-1803)为纂修四库全书馆的十位副总裁之一,他有条件接触到四库底本,并誊录一份自己收藏。

日藏本正文首页还钤有“广道意斋收藏图籍印”“藁宦”两枚朱印。“广

①黄虞稷撰,瞿凤起、潘景郑整理:《千顷堂书目》附录《杭世骏〈千顷堂书目〉跋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797页。

②赵永刚:《杭世骏年谱》,南京大学硕士论文,2006年,第204页。

③汪启淑:《续印人传》卷八,于良子点校:《印人传合集》,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,2019年,第206页。

道意斋”,为晚清知名学者、藏书家沈曾植(1850-1922)的书斋名号。“藁宦”,为沈曾植之弟沈曾桐^①的别号。沈曾植常以此号称呼其弟:“宋拓修内司十七帖残本,共五页,海石山房藏帖。丙辰重装修。……此残本虽不足二分之一,要为奇物。书报藁宦,河南本二惠兢爽矣。丙辰八月秋分日,寐叟。”^②“据《松江府志》,顾从义所刻,有《淳化帖》十卷、《柳诚悬兰亭》、《玉弘馆兰亭》、《十七帖》、《兰馨帖》,其弟从德刻《唐张旭书为烟条帖》。《兰亭》,藁宦弟有之。”^③然沈曾桐“藁宦”别号藏印较为罕见。日藏本首页同时钤有兄弟二人的书斋藏印和别号印,可知,此本自四库馆流出之后,清末民初曾归沈氏兄弟所有,后又散出为长泽规矩也所得,疑为1926至1932年间,长泽在北京及江南访书时所获。

结语

日藏《土官底簿》,有纸厂印记、蓝色横截印记,系清初抄本。因其有两淮盐政采进木记、满汉双文“翰林院印”,书内有浮签、夹签及墨笔、朱笔校改,卷末有杭世骏手抄朱彝尊跋文,结构和内容均与文渊阁本相同,是修撰《四库全书》所使用之底本,据之可以订正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关于此书底本为“浙江汪启淑家藏本”的说法。此本保留了四库底本较为完整的面貌,从中可以一窥《四库全书》校改及修撰的流程。从杭氏手迹、采进木记、沈氏兄弟二人之藏印,又可推知此本的流传递藏过程。

然此本还有若干问题尚未解决,如:上册书衣有一个极为模糊浅淡的钤印难以辨认;“发四分 张世□”后有数字未能释读;下册扉页所书“钦 露雨拾/驿丞写”“芒中遂月”未解何意;此本与海盐郑氏藏本、朱彝尊曝书亭藏本、汪启淑家藏本之间的关系如何等等,在此一并提出,期待方家指教。

【作者简介】辜梦子,中山大学历史学系(珠海)副研究员。研究方向:中国古代史、古典文献学。

①沈曾桐(1853-1921),光绪十二年(1886)进士,选庶吉士,授翰林院编修。甲午后主张变法维新,是康有为强学会的列名发起人之一。清末曾任广东提学使,是广东图书馆(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前身)的发起者。

②沈曾植著,钱仲联辑:《海日楼札丛(外一种)》,中华书局,1962年,第81页。

③沈曾植:《海日楼碑帖题跋·跋十七帖》,《同声月刊》第三卷12号。